

天然清流，不杂涓涓：忆刘浦江教授

邓小南

浦江是个纯粹的学者，他的追求清清楚楚，人生干干净净。他对学术事业，对学生倾注了自己全部的心血。浦江就像一支蜡烛，为学术，为学界，为学生，燃尽了自己。

初次感觉到浦江身体欠佳，是2014年的4月5日。当时我在哈佛任教，北大的几位老师和学生们照例相约在清明时节去万安公墓为先父邓广铭先生扫墓。群发的邮件中写明了集合的地点：骑车去的同学在西门集合，和刘浦江老师一起出发。当晚的邮件中，得知浦江突然腹痛而没有去。我深知浦江对先生的情感，担心他的身体状况，心里顿时“沉”了一下。后来听说他又参加教学活动，以为应该没事了。孰料当月12日，就得知了他罹患癌症极度羸弱的消息。接到这越洋而来的电话，当即泪如泉涌。

我不知该如何宽慰浦江，也不知该怎么克制自己。不敢直接和他讲话，只能在邮件中跟他说：“这些年太辛苦了。……人生中总有一些‘坎’，你是意志力很坚强的人，一定能迈过去。只是别急。”

此后的几个月，一直在煎熬与希望交错中度过。去医院探望，8人一间的病室，浦江坐在在走道位置的病床上，因化疗反应而只能喝些果汁；即便这样，也未改变他爽快的谈吐风格。接下来出院，入院……直到12月29日。当天本来以为浦江是要出院的，没想到情况突变。晚上7点多，意外地接到浦江的电话，他边吸氧边讲话，声音低沉而断断续续。他说：“小南，我的病情现在全面复发了。我决定放弃治疗了。”我意识到浦江是来告别了，不禁脱口而出：“浦江，你别……”哽咽着再也说不下去。12月30日，浦江回到家乡垫江。1月6日深夜得知他辞世的消息，一夜无眠。尽管早有思想准备，却无论如何不能想象我们之中从此没有了浦江。

冥冥之中真是会有惊人的巧合。17年前，浦江写过《不仅是为了纪念》一文，说“谨以此文纪念我的恩师邓广铭先生”。文章的最后一段，浦江说：

最后一次见到邓先生，是今年的一月七日。元旦前后，就听说医生已经给邓先生下了病危通知，这次去，是向他作一个最后的告别。当时他已昏迷多日，我真不忍心正视他那枯槁的容颜，默默地站了十分钟就退出来了。

那是1998年。没想到17年后的2015年1月7日，我们一行数人奔赴垫江，去与浦江“作一个最后的告别”。

1月9日东北义园与浦江的告别式、21日北大人文学苑的追思会，许多朋友称之为“精神的淬炼”。系里世界史专业的许平教授在邮件中对我说：

跟浦江的接触不多，只是他做系副主任的时候有些工作上的联系。但就是那一些工作上的联系，我看到他极其认真的做事风格，也认识了他没有任何矫情伪饰，真诚坦荡的品格。他对学问的执著，面对生死的那份浩然正气更是深深触动了我。这大概是我们面对他的离世之所以这么悲，这么痛的原因。……本来相信他能走过这一劫。没想到天妒英才！心里真的很痛，很痛，为他惋惜！但在追悼会上，当你和学生致悼词的时候，我突然想到，浦江这一生值了！我身旁的徐健和潘华琼都这么想。

记得你说，准备出浦江的纪念文集，应该！不仅光大他的学问，更光大他的精神，他是一个有精神的人。期待！

浦江生命中最后的9个月，集中凸显出他的性格与特质。他离开之后，网上、微博、微信，多年的同事、普通的教师、往日的学生，一片痛悼。作为一名教员，这就是最好的安慰与表彰。

我和浦江同是北大历史系中国史专业的学生，先后只差一届，在校期间却并不认识。1987年，在先父邓广铭支持下，他从中央党校调入北大中古史研究中心。浦江曾说：

每一想起邓先生，总是心存一份深深的感激，刻骨铭心。可以说是一种知遇之恩吧。一个普普通通的青年，没有高学历，当时也还没有在学术上做出任何成绩，仅仅见过一面，晤谈了两个小时，就能预卜他未来的发展前景，看出他的学术潜能。我想说，邓先生确实不愧是一位大师。

这一段话，在当时曾经引惹非议，但从中正可窥见浦江的自信与率真。他纪念我父亲的文章，题为《不仅是为了纪念》。其中的深意，今天我才更加明白。他对我父亲的理解，超过朋辈学生中的任何人。看着他写的《百年邓恭三》，感觉中恍如昨日。“恩师”这两个字在浦江心目中的位置，如朋友们所说，构成了现时的一段学术佳话。

当年我父亲鼓励浦江做辽金史研究，并且把自己下过多年功夫的《三朝北盟会编》交给他，请他继续完成整理校勘工作。记得开始样稿部分时，我父亲要求浦江逐段抄录《会编》文字，在此基础上进行点校。周围一些同事建议浦江与邓先生“通融”一下，若能复印，则可省去不少时间。浦江执意按先生意见办。一次我回到家中，正逢先父批评浦江字迹不够清晰。送浦江出门时，我宽慰他说：“我父亲可能过于苛求，你别在意。”浦江微微一笑，说：“邓先生说得对。”看着他坦诚的目光，感觉到他心地的澄澈，真是十分难得。

十多年前，意识到国内学界对于学位学历的重视，我曾经劝浦江趁年轻时在职申请博士学位。他的回答十分简单：“谢谢小南。我不相信北大也没有学术判断力！”浦江在北大工作27年，他通过27年的精诚努力证明了自己。他本科毕业，没有高学历，却取得公认的成就，成为一流的学者和优秀的博士生导师。

“学术判断力”在浦江心目中占居重要的位置。他的学术判断力，来自于“独

断之学”与“考索之功”。在辽金史研究中，他揭示出一些重要的议题，而且善于点破关键，对于繁难重大的问题往往有独到的见解。他将一时代的王朝史与北方民族史结合认识，对于辽金史的定位，以及如何深化相关研究有清晰的概念。他力图读“透”辽金史的文献，而且充分利用宋人记载，充分利用契丹等民族文字和考古材料，真正具备了对宋辽金史进行通体研究的眼界和学识。

浦江一方面学术敏感性、悟性突出，另一方面学术自觉性、自律性很强。他对学界整体脉络、演化趋势的把握，以及对个人治学目标、学问路径的认识都了然于胸，毫不混沌。浦江觉得，长期浸淫于一个学术领域未必是好事，可能意味着学术创造力的枯竭。他希望挑战重大题材，追求更为恒久的学术价值。他任教后，挤时间去中文系旁听训诂学的课程，请社科院民族所的刘凤翥先生教授契丹小字，与学生共同研读，力争把语言学、人类学与历史学紧密结合起来。早在2004年，他就在《中国社会科学》上发表了《德运之争与辽金王朝的正统性问题》，后来又在《唐研究》上发表了《正统论下的五代史观》一文。他力图突破王朝断代史隔离的界限，力图突破民族史和中原王朝史研究的藩篱，从更为弘阔的格局中深入观察古代中国的发展历程。他希望能对中国古代政治文化的整体脉络做一梳理，无论做哪一时期哪一方面的研究，都朝向这样一个通达而实在的目标。这些年里他以华夷观念为切入点，关注历史学视野中的正统论；他对前段的政治文化史包括南北朝隋唐的正统观念，后段像元明之际的民族主义想象乃至近代特定的历史语境之类，都有敏锐深到的研究。以他过人的资质，若能假以时日，做出来的成就应该是非常突出的。

上世纪90年代中期到2005年，我和浦江在历史系共同开设“宋辽金史专题”课程；其后我们也在宋辽金史方向共同招收研究生。在中心小院里，我们的办公室门靠门，学生们也都相互熟悉不分彼此。指导学生的事，在浦江心中份量很重。招生时的“挑剔”，刨根问底的了解，对于学术潜质的重视；学生正式报到前的“小灶”和入学后的“补课”，都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他从基本文献入手训练学生，标准从不含混，要求明确严格而具体到位。2005年，台湾“中研院”史语所前所长黄宽重先生来北大讲学，辞行时对我说：“北大历史系的博士，应该形成品牌。目前是好的很突出，却也有很差的。”其后我和浦江说及这一评价，他沉吟良久没有说话。他自2006年担任历史系副主任，对于海内外历史学界的优长及短板一清二楚，对于学科发展不仅认识深刻而且路径分明。他为本科与研究生教学的改进殚精竭虑，对古代史博士论文的指导也不遗余力。他开设的“《三朝北盟会编》研读”和“《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研读”，是文史方向研究生收获最为丰实的课程，研读与实践结合，将学生们切实引入了“研究”的门径。2007年以来，他负责中华书局二十四史点校本修订工程中的《辽史》修订，每个周末都带领学生集体读《辽史》，追踪史源，穷尽史料，逐字逐句讨论校订，非常有意识地在这样一个过程中，带出一批辽金史研究的新军。

浦江开口见心，坚持己见善于争议是出名的。但他争的，不是自己的地位和待遇。他去世后，大家才惊讶地发现，这么多年来，他竟然没有获得什么重要的奖项。他所坚持的，是心中的原则。事情堆到他面前，他处断迅速而从不推诿；面对学术议题，他畅谈所见而从不犹疑。2004年我们中心“唐宋时期的社会流动与社会秩序”项目组去山西考察，随同参加的有考古文博学院的青年教师和博

士生。回校总结时，他们印象最深的就是沿途听到王小甫、刘浦江等教授充满学术价值的高谈宏论，争议中处处是学术的锋芒与亮点。我和浦江同事多年，彼此的默契，并非来自行事风格的近似。恰恰相反，我做事优柔寡断而浦江则是思虑细密而行事果决。许多时候，我们对问题的看法并不一致，争执过后，有时他退让一步，说“谢谢”，这就是婉拒而暂停争议了；有时我沉默了，他会笑着对旁边的同事说“小南她不会这样做”，这是表示他理解我的想法而他的意见最终胜出了。凡此种种，无须解释，都凝聚为心领神会的感觉。我时常庆幸身在中古史中心这个纯净的环境中，同道之间的坦荡情谊，全然建立在事业的基础之上。

我们的同事说，刘浦江教授是真正学者的表率。确实如此。浦江是真学者，好老师。他有思想，有风骨，有干才，有境界，在喧嚣的环境中能够出淤泥而不染。他是非判明，勇于是是而非非。借用宋人的话说，就是“质犹近古，纯正笃实”，“天然清流，不杂涇泾”。他面对学术议题的敏锐犀利，面对烦剧工作的责任担当，面对挑战坎坷的达观执著，乃至他的严厉，他的风趣，他的脾性，都使他具有特殊的人格魅力。

浦江是个纯粹的学者，他的追求清清楚楚，人生干干净净。他对学术事业，对学生倾注了自己全部的心血。在最为痛苦的时候，他首先想到的，他念念不忘的，是《辽史》校点整理的收束工作，是尚待刊发结集的篇章，是学生的论文和今后的安排。他割舍不了的这一切，是在最后时光中支持他顽强治疗的动力。浦江就像一支蜡烛，为学术，为学界，为学生，燃尽了自己。

（作者为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教授）

《文汇报》2015年2月6日《文汇学人》